

## 第七章、知識經濟時代的身體政治學

繼續上一章探討大陸社會建構知識產權的多元論述的結盟策略、內部競合與催化機制後，在此將思考這樣一套多元論述施加於人的狀況，亦即身體處在上述知識經濟文化邏輯下的狀況，這也就是知識經濟時代的身體政治學。

以下將分幾個問題進行探討：首先，知識經濟將知識與經濟連結，其對身體的意義為何。第二，中共政權雖然過去強調政治掛帥，目是仍是威權體制，但它在國家權力的行使上是否符合 Michel Foucault 與 Giorgio Agamben 所提到的現代國家的特徵。第三，結合以上有關知識經濟與身體政治學的探討，思考知識產權觀念下的身體政治學。第四，探討知識產權與身體欲望的關係，以進一步顯示為何知識產權對人有激勵作用。第五，探討知識經濟時代身體政治學的理論意義。第六，反思在知識經濟時代下，身體的解放與能動性的問題。

### 第一節、知識經濟：人向身體的回返

自 Plato 開始，身體在論述中一直被建構為感官欲望的、非理性的、物質的、生物的，它是與心靈或意識相對，後者往往是代表神聖超越的、理性的、精神的、符號的。即使到了 Nietzsche 與 Deleuze，亦未完全推翻此一建構，只是他們提高了身體的地位，認為身體所代表的力量衝動，是生成一切的根本。

由 Plato 開始，特別是 Descartes 展開的理性時代，身體與意識的關係也常被建構為二元對立的，且意識超越身體之上，意識才是人的本質，身體常是對意識起負面影響，導致人的意識不能彰顯的原因，因此身體在論述中常是一個他者，或者遭到被放逐的命運。直到 Nietzsche 身體才在哲學中取得中心地位。

身體與意識也是一個被建構的符號，而符號的功能是幫助人們在變動不居的環境中，建立一套意義結構，因此符號的邏輯是既固定又變動。相對於固定與變動，身體與意識常分別與有限、無限建立連結。身體常被認為有無限的欲望但卻有著有限的生物性限制。意識常被認為有無限的符號運作能力，但也有追求事物本質的能力，即能使意義固著在有限的範圍或對象上。<sup>1</sup>有限與無限的二元對立，

---

<sup>1</sup>王宇航，知識經濟與人才素質（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頁 60。

可說是包括身體與意識等一切的符號共同具有的特性，包括上述 Plato 與 Nietzsche 對身體的建構亦可納入此一範疇，只是 Plato 強調身體的有限性對意識無限性的侷限；Nietzsche 則強調身體的無限性創造了有限的意識。

在知識經濟或知識產權的概念，亦可與身體與意識的有限性與無限性互相呼應。知識一般指涉的是屬於意識的符號活動，經濟一般是指身體的求生活動，產權也被識為是人身體的延伸。因此意識一般是與知識連結，身體一般是與經濟或產權觀念連結。知識經濟或知識產權的觀念，代表著知識為經濟服務的要求，代表著心靈為身體服務，這是一種回歸身體的轉向，它根本的翻轉了長時間以來身體相對於意識的他者地位。

在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中，經濟成為社會的主要的論述，但是仍是經濟歸經濟、知識歸知識。至 Karl Marx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強調經濟基礎產生上層建築，與上層建築為經濟基礎服務，預示了意識向身體的回歸，Marx 點出了意識活動應為具體生活服務，意識活動不能去歷史、去社會的進行，建立了由經濟來看知識的視角。<sup>2</sup>但必須要到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才為經濟所收編，意識才真正的成為為身體服務的角色。若以中共政權的理論發展來看，雖然毛澤東重提意識的決定性，認為意識才是決定人階級歸屬的本質。<sup>3</sup>但鄧小平又重新強調「黨和國家的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sup>4</sup>人民身體溫飽和小康生活的追求才是國家計劃、調控經濟活動時的根本目標，鄧小平南巡的名言之一就是：「要發達起來，窮了幾千年了，是時候了，不能等了。」<sup>5</sup>

知識經濟是一個創造知識產權的活動，若進一步考察身體與意識、有限與無限的建構，並以此來看知識產權的運動流程，可以有如下觀察。首先在知識產權的生產方面，是強調以身體的有限性去承載意識對符號的無限性生產，即身體以其有限的精力與歲月，要去產生無限的創意。第二，在知識產權的流通與消費方面，則要求以符號的有限性去面對身體的無限性，即意識中的符號活動的創意成果要固定化為可複製的形式，並符合社會語境的對符號約定俗成的意義界定，在知識經濟中的知識是指能夠產業化與商品化的知識，但這個固定的符號卻要面對身體無限的衝動與欲求。也是因為如此，一個意義受框限的知識商品是不可能滿

<sup>2</sup>Karl Marx,「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上(廣東:人民出版社,1976),頁81-85。

<sup>3</sup>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third edition (NY: The Free Press, 1999), pp.31-54.

Kalpna Misra, *From Post-Maoism to Post-Marxism: The Erosion of Official Ideology in Dengo China*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183-216.

<sup>4</sup>「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共產黨新聞,1981年6月27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3/65374/4526448.html>。

<sup>5</sup>「光輝歷程：從一大到十五大繼往開來——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人民網,2007年3月10日檢索,<http://www.people.com.cn/BIG5/33831/33842/33845/34511/2575434.html>。

足身體無限的欲求，也就由此啟動不斷進行創意生產的動力，必須一直生產新的知識商品來填滿身體的無限欲望。符號的無限生產，與身體的無限需求，經濟活動隨之熱絡，並隨著發達國家向全球傳播，知識經濟的論述霸權得到建構，身體也被提到空前重要的地位。

在漢芯案中可以看到陳進在試圖發明晶片時，以有限的身體去面對方方面面的急迫壓力。在王同億的辭書中，可以看到編寫辭書既要有創意，又要符合約定俗成的字詞解釋，顯然知識的活動不是全然自由的。由娃哈哈和爽歪歪的品牌策略，也可見到直接滿足身體欲求，並且不斷推陳出新以滿足身體各種不同需要，是企業成功、永續經營的不二法門。此外，由本研究對網路媒體的討論，亦可見網路媒體最能符合人對無限與有限的須求，網路在看似無限的溝通網路與形式中，重覆提供幾個固定的框架，一種既多樣又安定的感覺，相當符合人一向被建構在有限與無限張力中。

總之，知識經濟、知識產權觀念的產生是對身體的回歸，意識活動在此也被要求要為身體服務。但在知識產權運作的要求下，在符號的流通與消費階段，符號的意義確受到限定，而意義的限定是某種權力意志介入的結果，特別是知識產權是國家法律建構下的產物，因此接下來就現代國家的權力運作問題進行探討。

## 第二節、中共政權的現代國家性格

第二章討論 Michel Foucault 與 Giorgio Agamben 對現代國家身體政治學的看法，綜合他們的看法，現代國家與身體的關係特徵有三：第一、民族國家與個人身體的經由公民身份得到辯證統一。第二、國家權力兼具壓迫與提升身體的效果，但皆以提取身體的最大能力、滿足身體的須要為目的。第三、此一現代國家的身體政治學，若要展現具有正當性的強制力，須要與其他論述結盟，因為權力終究是多元論述合謀下的策略。中共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這樣一個現代國家。國家與身體的密切關係，具體呈現在憲法、法律中。<sup>6</sup>

首先，在國家與身體的辯證統一上，例如大陸憲法在其序言中描述其建國歷程是「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總綱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所謂的人民的界定是結合了公民身份與人民血緣、地緣等生物性特徵，憲法提到「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而國籍法規定「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中國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國，具有中國國籍。」公民即可享受國家認可的權利與義務。公民的權利即是包括人

---

<sup>6</sup> Andrew Gamble, David Marsh, and Tony Tant eds., *Marxism & Social Science*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pp. 217-238.

身自由，即「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等各項自由、平等權、參政權、受益權等。公民的權利，經常是伴隨著生物性特徵而取得，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除外。」此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法提到「為了證明居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公民的身份，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便利公民進行社會活動，維護社會秩序」故設立居民身份證法，發給條件是「居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年滿十六周歲的中國公民，應當依照本法的規定申請領取居民身份證。」居民身份證上的「公民身份號碼是每個公民唯一的、終身不變的身份代碼，由公安機關按照公民身份號碼國家標準編制。」<sup>7</sup>由以上這些基本法律可見，國家建立基礎在公民，公民身份是經由父母的中國國籍或出生在中國等身體在出生時的狀況來取得，至十六歲可以申請領取居民身份證，納入一套的編碼系統。十八歲可取得參政權。因此，國家與身體互為充要條件，國家主權屬於血緣來自中國、出生在中国的公民，國家因此成立，人民取得權利。而且身體的年齡會決定國家介入程度與身體權利的多寡，愈成熟的身體，國家的干預和照顧愈多，如身體在十六歲被編碼，而十八歲可以參政，均可見身體的狀況與國家權力的施展、公民權利的取得密切相關。

第二，在國家兼用肯定性與否定性權力，利用對身體的懲戒、調節以提取身體最大力量方面：首先在國家的肯定性權力上，憲法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涉及對人的經濟學、社會學分類，再加以政治學的組織，組織形式經常決定不同群體的關係，以及力量的整體展現方式。除了組織各階級外，也針對個人，例如憲法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國家通過提高勞動者的積極性和技術水準，推廣先進的科學技術，完善經濟管理體制和企業經營管理制度，實行各種形式的社會主義責任制，改進勞動組織，以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發展社會生產力。」「國家發展社會主義的教育事業，提高全國人民的科學文化水準。」「普及科學和技術知識，獎勵科學研究成果和技術發明創造。」「國家培養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各種專業人才，擴大知識分子的隊伍，創造條件，充分發揮他們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而保護產權、調動勞動者、培育人民的目的是把大陸「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對身體良好的分類、組織、鼓舞與訓練才能提高

<sup>7</sup>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國政府網，2005年6月14日，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iliao/flfg/2005-06/14/content\\_6310.htm](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iliao/flfg/2005-06/14/content_6310.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中國政府門戶網站，2005年8月2日，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banshi/2005-08/02/content\\_19458.htm](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banshi/2005-08/02/content_19458.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法，中國政府網，2005年6月28日，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test/2005-06/28/content\\_10582.htm](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test/2005-06/28/content_10582.htm)。

身體的能力讓國家富強。其次在國家的否定性權力上，「國家維護社會秩序，鎮壓叛國和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制裁危害社會治安、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和其他犯罪的活動，懲辦和改造犯罪分子。」當然這也包括前述中共的網管措施中強調要封鎖有害訊息，有害的訊息危害人民精神生活，最終也會危害自己與他人的身體，例如色情氾濫，可能造成縱欲，有害個人與整體人口的身體。不當的政治訊息，破壞國家組織形式，可能造成動亂，也對人民人身安全不利。危害國家，危害其他國民身體的人，必須加以處罰，改造。<sup>8</sup>

除了法典外，在政策方面，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將國家發展軌道轉移到經濟成長方面，更與現代國家的權力觀點接近。由近年中共的國策亦可見國家的努力目標是照顧人民的身體，這也是維持中共永續執政的充要條件。例如人才強國戰略、科學發展觀、建設創新型國家，均是為了全面小康。所謂全面小康是人民的世俗面的身體欲望、物質生活得到滿足，不是追求超越或神聖的目標。<sup>9</sup>而且此一小康還必須是全面的，分配不均引發社會矛盾衝突，將危及中共統治。並且中共相當強調自主創新以促進經濟發展，創新的無限可能性，可以滿足無限的身體欲求。因此國家機器必須在社會全面的推動有助均衡的各項政策，但這也代表國家的政治力量對身體的多元衝動與須要進行全面介入，這一介入會制約也會驅動著身體衝動的走向。<sup>10</sup>

既然國家依靠著身體，身體也會對國家進行反作用。例如中共近年努力追求經濟成長，希望把餅作大，把餅切好，既要求均也要求富，以化解各項社會矛盾。中共對這些問題也表現出很大危機感，即是希望照顧更多的身體須求、滿足更多的身體欲望，以建立中共永續執政的基礎。例如中共對三農問題、人民上訪均表現極大的重視，並提出建構和諧社會的主張。照顧不好人民的身體，將深刻的危害中共的正當性，2006年十六屆六中全會中即再次強調「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戰略任務，是對我們黨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sup>11</sup>中共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也語重心長的告誡「中國只要不搞社會主義，不搞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條路都是死路。」<sup>12</sup>中共對政權與身體的互依性有深刻的體認。

---

<sup>8</sup>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sup>9</sup>「專家和百姓眼中的全面小康」，南方網，2002年11月10日，  
<http://big5.southcn.com/gate/big5/www.southcn.com/news/ztbd/16thcpc/keywords/200211130677.htm>

<sup>10</sup>Bertell Ollman, *Market Socialism: The Debate Among Socialist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 1-52.

<sup>11</sup>「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新華網，2006年10月18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0/18/content\\_5218639.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0/18/content_5218639.htm)

<sup>12</sup>「光輝歷程：從一大到十五大繼往開來---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第三、中共政權力爭與其他論述結盟，以營造正當性方面：此一部份在第六章已有許多討論，如前章所述，威權體制有更多的資源與更高的意願去爭取其他論述結盟，例如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與胡錦濤提出的「和諧社會」，均是努力廣結善緣，以求得道多助的重要主張。

總之，由大陸的法律與近年的政策，中共政權也是基於身體與國家的辯證統一，也適用著這一套現代國家的身體政治學。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後，經濟成果成為爭取正當性的主要方針後，國家與身體更是同步拉抬，此由大陸人民生活改進與國力、國際地位同步提升即可得到證實。<sup>13</sup>同時，在照顧更多人的身體之後，中共政權也就符合了更多論述立場的利益，擴大了正當性的基礎。

### 第三節、知識經濟時代的身體政治學：

#### 知識產權的建構與宣傳

經由以上的討論可知，知識經濟與現代國家兩者均將目光轉向身體，知識產權即為兩者匯合下的合理結果。知識產權對身體的作用即為知識經濟時代的身體政治學。知識經濟透過知識產權得到推動；國家機器透過媒體、法律以建構知識產權，身體在這些權力意志中受到調動並得到滿足，因此知識產權是現代國家身體政治學的表現方式之一。

知識經濟與伴隨知識經濟的電腦網路技術因其造成資訊快速流動的特性，一般被建構為全球化的論述。全球化的特徵就在於它對主權國家創造了新的機會與挑戰。<sup>14</sup>國家為了適應此一全球化論述，創設知識產權觀念，並將知識經濟與知識產權連結，將國家橫阻在全球化的知識經濟與人之間。同時也建設官方的網路宣傳機制與網路審查制度，希望使網路媒體傳播國家希望人民聽到訊息，以有利於國家。例如由第二章的說明，可見大陸知識產權相關法規的完備程度是與大陸參與國際經濟與世界性知識產權相關公約的程度成正比。而大陸對網路媒體的控管也是隨著全球化趨勢日漸完備。<sup>15</sup>

知識產權的法律，以及透過網路媒體傳播知識產權相關事件，是國家處於知識經濟潮流挑戰下，利用知識經濟、網路技術，並抵抗其全球化負面效應的手段，同時也是提取身體最大力量的方法。人民在國家設立的知識產權觀念，與國家介

---

<sup>13</sup>Seymour Itzkoff, "China - Emerging Hegemony A Speculative Essay," *The Journal of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udies*, vol. 28, iss. 4 (Winter 2003), pp. 487-497.

<sup>14</sup>江啟臣，「全球化」，張亞中，*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2003），頁 271-298。

<sup>15</sup>曹新明，*中國知識產權法典化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頁 142-148。

入的網路傳媒下體驗知識經濟。

由前文的案例發現，王同億事件、漢芯案在成為知識經濟、自主知識產權正面案例時，種種民族的希望、政治的要求、知識的發展、經濟的成就都參與建構它們，賦予它們至高無上的榮耀，憑藉它們進行宣傳，主流立場得到建立，希望藉此調動更多知識創新的積極性。而當王同億事件與漢芯案墮落為偽劣假冒案例時，主流立場利用揭批它們，再次得到宣傳，但在？批它們的同時，也顯示了社會當中存在另一引力，那就是知識造假、經濟無序、追逐私欲、民族落後的非主流立場，非主流立場是主流立場的他者，但也代表社會另一種驅力，在主流立場須憑藉否定他者以證成自己的同時，非主流立場也同時得到證成，兩者互相拉抬，共同生產合乎知識經濟、知識產權規範的實踐，但也吸引了偽劣假冒的實踐。但不論正面或負面案例，均可為國家機器領導的主流立場作宣揚或批判之用，拿來強化國家對知識產權與知識經濟的建構。事實上，王同億事件與漢芯案均是大陸眾多偽劣假冒中的一個，它們也是這一個意義生產線上的產品之一。利用國家介入的網路傳媒反覆、快速的重播，國家主導的主流立場與國家對非主流立場的價值定位被自然化為真理，虛擬轉為真實，偶然變為必然，就鼓勵更多人投入有關知識產權正面，以及意圖攀附知識產權之名的負面實踐。正面與負面案例都是國家在強化論述的生產要素。在此過程各種創意商品或偽劣商品同時上市，人民的身體欲求透過消費類似娃哈哈的爽歪歪得到滿足；遵守規範的創意人因得到知識產權而使身體得到延伸，並獲取利潤。不守規範的創意人也因偽劣假冒而暫時獲利，同樣使身體得到滿足。而處罰那些被捉的犯罪分子的身體，也同樣在證明了國家的權威，保護了大家的身體遠離不良商品，而得到安全。而一個使人民身體滿足的國家，一個經由處罰罪犯以保全守法大眾身體的國家，就會得到證成與肯定，國家也因此可調動更多身體投入知識產權的論述生產流程，以有利於民族發展，這也就是為何能夠扛起民族飲料品牌大旗的娃哈哈，能夠那麼受到大陸人民與政府的肯定的原因。

換言之，整個有關知識產權對身體的作用流程，可概括為以下幾個階段：

首先，推動知識產權，是國家為求因應知識經濟，由國家主導下吸引民族求先進、政治求公益、知識求創新、經濟求規範等多元論述合謀而成的主流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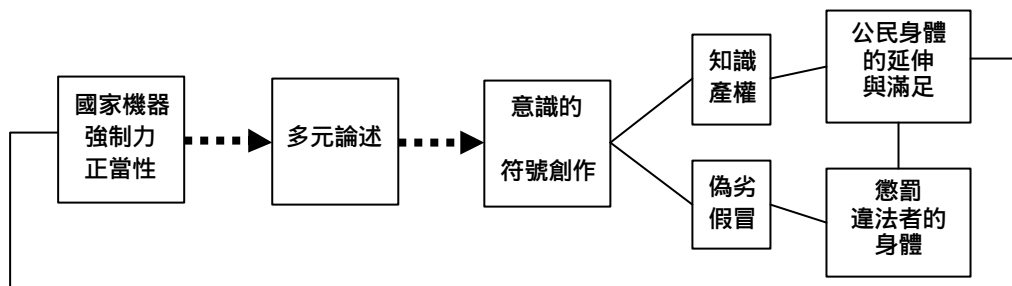
第二，國家經由法制與宣傳手段強力介入以拉抬主流立場的建構與實踐時，作為主流立場反作用力的知識造假、經濟無序、追逐私欲、民族落後的非主流立場也將隨之建構與實踐，以致有關知識產權的正、反實踐與事例一起出現。

第三，主流立場為求建構自身，對正反案例加以宣揚、揭批，並透過網路等媒體反覆、快速播送，將同時驅動主流、非主流立場彼此拉抬，一起驅動人的意

識層面進行合法或違法的符號創新活動。但由國家主導的主流立場也利用知識經濟等論述限制各種符號創新活動只能限制在非政治領域。

第四，意識層面的符號創新活動是為了滿足身體既要求安定，又要求變化的各種欲望，感官刺激。在此消費者的身體得到滿足，創意人得到知識產權的肯定，身體得到延伸，製造偽劣假冒罪犯的身體被懲罰。在身體都得到滿足與發展，並且懲處不法後，國家保護了身體的安全、維持了民族的存續，國家的正當性再次被加強。

圖五 國家與身體的再生產流程



( → 表示生產方向；---→ 表示催化方向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此一現代國家面對知識經濟所開發出的身體政治學，其調動身體能量的機制有幾個特點（如圖五）：

一、施力或激勵機制的多樣化：創意的知識生產是來自激勵而非懲罰，創意也經常來自跨領域融合。因此國家利用其主導、掌控法律與宣傳工具，催化了多元論述由各方對人施壓，以高覆蓋、多樣化的方式，調動人的創造發明能力。此因創意既來自現有的符號，但又要不同於現有的符號，因此激勵的管道必須經由多元論述，多元論述的激勵背景提供進行不同連結的可能性。依照前文的文本的分析，可見黨國為公/為私、民族先進/落後、知識創新/造假、經濟規範/無序等八個論述立場，結合了網路媒體，由各方對人施壓，而每個論述各有其配套的激勵與懲罰制度，使人無所遁形，並在激發多元實踐後，再由國家機器界定知識產權的標準。<sup>16</sup>國家機器利用知識產權激發創意於前，並以知識產權規範創意活動於後。前述漢芯案中陳進的處境，即為最佳例證，陳進面對民族對自主電腦晶片的需要、市場的誘因、知識創新的獎助、政府推動晶片研究的政策，使他有了創新的動力，但在發現主客觀條件力不從心後，也繼續在同一壓力來源下，轉而以他

<sup>16</sup>王宇航，知識經濟與人才素質，頁 72。



牌晶片魚目混珠。另外如王同億則是振振有詞的強調，編輯詞書是為了讓辭書符合社會最新的語言發展，知識創新的驅動似為他投入著作辭書的動力，但是他的辭書也推向了市場，追求利潤也是他著書的動力。而漢芯案與王同億的辭書雖然都是失敗的例子，但他們製造的偽劣商品也是來自跨界的融合。娃哈哈的宗慶後則一再提到他辦企業只為利、不為名，他認為企業盈利才能使企業負起社會責任，市場逐利應是他認為滿足社會期待的動力來源。娃哈哈產品的創意則往往連結了社會許多不同的既有須求，如非常可樂，它是大陸知名品牌娃哈哈的產品，又是大家熟悉的可樂，又滿足了大陸的民族意識，因此能夠打下一定市場佔有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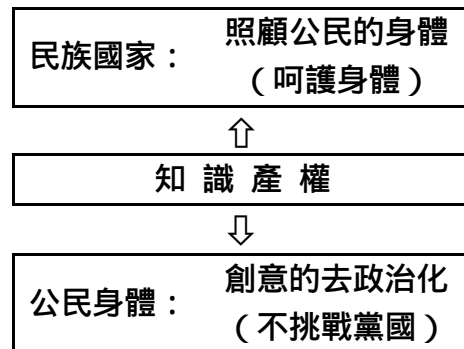
二、國家與身體的共謀：國家利用照顧身體的藉口，經由知識產權法律，將創意活動帶向經濟層面，因此讓國家同時享有對創意商品的意義詮釋權與意義限定權。而消費者則經常希望大陸產生足以挑戰國際的商品、品牌，此因個人身體與民族國家是一體的兩面，經由消費而產生民族強盛的感覺，往往能為身體帶來最大快感。這由前述案例中可以發現，商品、商標，只要能與民族主義連結，就能給大陸群眾帶來莫名的興奮。作為一個發明人，則希望經由發明，取得知識產權，使個人的身體得到延伸與滿足。因此一個成功的創意商品、知識產權的創造，它既對國家有利，也對消費者或發明人的身體有利。例如，前述各個例子，都曾經被推為中國的代表、民族的光榮，國家與消費者須要這樣的商品，而發明人也以爭取這個頭銜為目標。只是當王同億的辭書與陳進的晶片一旦被發現是一個丟盡國族臉面的偽劣產品後，受到的撻伐也是空前的。

三、創意知識為身體與國家服務：意識層面的符號創意活動被誘導到經濟方面誘導，以滿足身體欲望為目的。創意轉向身體的因素是，一方面知識經濟強調創意知識為經濟、為身體服務；二方面國家機器則以知識經濟為藉口，促進國家經濟以滿足人民身體為目的，也將知識創意主要限縮在經濟範疇，而經濟發展有助民族復興，現代民族國家又經由公民身份與身體的權利有著密不可分關係，民族復興往往能讓人熱血澎湃，製造身體的快感。三方面是身體被建構為有多種欲望須要滿足。總之，知識經濟，現代國家、公民身體，一起回歸身體，三者共謀一起將創意知識限縮在經濟範疇，創意思考只對身體服務。此一對創意的誘導，對身體是一種呵護，同時也是一種限制，讓身體無法經由更開放的創意享受到更多可能的快感。這對中共政權的意義在於，創意思考不會危害黨國體制。創新思考一向是集權政治的大敵，但透過國家機器對創新活動的介入後，將創新活動往經濟方面誘導，使創新活動去政治化，完全侷限於滿足經濟與物欲的目的上。例如爽歪歪的爭議只限於文化與經濟領域而不及於政治，又如宗慶後期待國家機器應該是保護知識產權，鼓勵企業創新的「保護神」。<sup>17</sup>均可見政治部門取得超越

<sup>17</sup>「企業如何成為創新主體？聽聽宗慶後怎麼說」，娃哈哈，2007年2月26日檢索，  
<http://www.wahaha.com.cn/news/company/2006/03/06/wahaha796.html>。

創新思考，甚至是指導、保護創新的地位，佔據一個免受創新思考質疑的優越地位。

圖六 知識經濟時代的身體政治學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因此，中國大陸在知識經濟時代下的身體政治學，即是黨國體制透過知識產權的法制與宣傳工作，調動多元論述彼此競合，共同對公民的創意活動加以激勵或限制，使創意商品滿足公民的身體，在此過程國家與身體均得到證成。這樣一個身體政治學，其實是一套以知識產權為介面的國家與身體關係之學，國家與身體在此互為鑲嵌、互相證成、互相驅動、互相制約，具體而言是國家激勵身體力量之學，國家滿足身體須要之學，也是身體於從屬中取得能動與解放之學（如圖六）。

#### 第四節、知識產權與身體欲望

國家機器經由知識產權的建構以回應知識經濟，以滿足身體與民族發展的需要。其實更進一步來看，知識產權本身也是一個滿足身體欲望的成功商品。商標，這才會讓知識產權對身體產生誘因，使國家利用知識產權激勵身體、收編身體。經由探討知識產權為何能引起身體的共鳴，從而產生激勵身體的作用，可以建構出知識經濟下的身體動力學。這可由商品的邏輯與符號的邏輯兩個層面來思考。

在商品的邏輯方面，知識產權究竟呼應了身體那些須要而成為吸引群眾的商品，這可對照娃哈哈的成功經驗來加以思考。由娃哈哈的那些成功商品可以發現，一個商品若能在產品與宣傳上呼應既有的語言符號，並對目標的消費族群進行高覆蓋、高頻率的宣傳、銷售攻勢，以直接滿足身體需要，是一個有效的銷售方法。但此一銷售策略是建立在幾個前提上面。

首先是社會存在著既有的語言符號，並且這一既存語言符號已為消費者接受，如此商品才有著力點，創意才有進行不同連結的起點。例如娃哈哈的兒童營養液，就是因當時大陸已有多種成人營養液，並且已為消費者接受，故娃哈哈針對兒童製造的營養液能夠有社會基礎。另外娃哈哈的品牌優勢也是一例，消費者已經建立了對娃哈哈的品牌忠誠，只要是與娃哈哈建立連結的商品即會產生母帶小？的效果。

二是大陸社會的多樣性與多變化，如此才能夠在人群中鎖定目標群體，並向他們推出新的商品。大陸社會並非鐵板一塊，一向是毛澤東或鄧小平對中國的認知。<sup>18</sup>而大陸社會多變的可能性在於多樣的社會往往容易產生改變，即多樣的社會易於產生多樣的連結，產生變化，這也是毛澤東或鄧小平對中國的認知。

因此成功的商品必須是迎合語言氛圍中已經存在的符號，呼應身體對於信任與安定的須要；必須呼應社會的多樣性背景；必須是直接訴諸身體的快感刺激，滿足身體多元、多變的衝動。接下來就是投入的力度，這涉及銷售通路與管道問題。這幾個方面用宗慶後的話來說叫「小步快跑，滾動前進」。換言之，面對多樣、多變的社會，在既有的慣性下，順勢而為，摸著石頭過河，不要急於長遠規劃，是較可行的生存發展手段，這也是「宗氏兵法」也常被稱為「無定式宇宙流」的原因。

總之，身體被建構為一個多種力量交？的處所，它期望著變動，也期望著安定，一個成功的商品要滿足這些衝突的、不同的身體衝動，一個消費活動就是滿足身體多種權力意志的過程，經由消費，身體被商品經濟收編，同時也滿足了身體的快感。

由上述商品與身體欲求的關係，進一步可再由符號的邏輯來看。其實意識、身體均是一個符號，而符號的共通邏輯就是既有限又無限，每一個符號既通向所有的可能意義，但在當下的語言規則中它又被限定在一定的指涉的範圍，身體既

---

<sup>18</sup>毛澤東，「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頁48-50。該文指出：「現在中國革命形勢是跟著國內買辦豪紳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的繼續的分裂和戰爭，而繼續地向前發展的。所以，不但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沒有疑義，而且這些紅色區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於全國政權的取得。」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347。該文指出：「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然是符號的建構，因此也具有無限與有限的特性，這與前述身體既要求變化又要求安定互相呼應。這也可以前文各項案例中網路媒體內容的單調性為例，網路媒體是傳遞訊息的管道，網路媒體雖然創造了多個網站，或多樣的網頁形式，但不必然就會產生多樣的意見，甚至符號存在的時間和其意義的內爆度是成反比的，這固然和大陸網路受官方控制有關，但也反顯了人對多樣與安定的須要。

但上述的前提中也可發現為何多樣、多變的社會，卻會存在一個既存的語言符號。社會的多樣、多變性與意義的固定性之間存在著張力。這一問題可以由追蹤結構主義到後結構主義的轉變來思考，結構主義認為存在一個被建構的、先驗的符號意義結構，後結構主義則論證了符號的建構與解構、先驗與後驗的共生性，即後結構主義認為社會的意義結構是不固定的。<sup>19</sup>這其實告訴我們，人創造符號是為了將意義固定下來，在長久的歷史中，人們也曾經確信符號的功能如此偉大，但面對變動的社會，這實際上只是又一個權力意志的表現而已，符號永遠無法真正固定它的意義。特別在知識經濟時代，符號的生產、流通、消費更多更快，由符號所建構的現實的變動也更多更快，而經濟活動要求的又是明確的產權與價格，這造成傳媒必須複製相同的意義，滿足身體對安全與信任的要求。例如網路媒體在多樣傳播形式中傳播的相近的內容，正是符應了身體對新奇與安定的衝突須求。並且就如人期待符號能夠幫我們固定住變動的社會一般，一個成功的商標或商品就是此一滿足身體多種須要的衝突產物。一方面商標或一個新的商品代表了創意，刺激著身體，滿足著身體多樣的須要；一方面商標或一個新的成功創意商品也由其固定的圖文標示、與既存語境的呼應，得到消費者的信任，滿足著身體對安定的須要。

知識產權正是呼應了上述商品與符號兩方面的邏輯，滿足了身體的欲望，這可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局徽，以及該局對局徽的說明文字作為例子。其實局徽也可視為一個商標，它也是承載了許多的意義。<sup>20</sup>

---

<sup>19</sup>Martin Jay, *Marxism & Totality: 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acs to Haberma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510-537.

<sup>20</sup>「關於局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2007年3月16日檢索，  
[http://www.sipo.gov.cn/sipo/gk/jh/200306/t20030624\\_97177.htm](http://www.sipo.gov.cn/sipo/gk/jh/200306/t20030624_97177.htm)

圖七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局徽



資料來源：作者摘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知識產權局網站<sup>21</sup>

大陸知識產權局局徽如圖七，標誌是由五星和英文字母 IP 組成。左半邊五星及 I 圖形為紅色，右半邊的 P 圖形為藍色。在「關於局徽」的解說文字裡闡釋了圖樣的意義。第一，標誌的左半部分的「紅五星圖案，象徵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國家性和權威性。五星對外又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標誌的右半部分是由英文字母 IP 演變而來，字母 IP 是英文 Intellectual Property 的字母縮寫，體現知識產權領域的工作範疇和性質，加強了運用於國際範疇時的可識別性。」第三，「標誌採用紅藍兩色相配，紅色代表中國，藍色表示知識和資訊。」第四，「標誌的整體造型穩重、向上，並充滿現代感和動感，體現了國家知識產權局作為國家級的知識產權保護機構，代表國家行使權力，保護知識產權，為國家的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同時，穩重向上的感覺，又喻示著國家知識產權局的事業蓬勃發展，蒸蒸日上。」第五，「整個圖案呈橢圓形宇宙星際運行軌道，在浩瀚的宇宙空間，寓意知識的無限性。」<sup>22</sup>

整個局徽的意義，可分析為如下幾方面：一是中國與國際接軌，例如五星對外代表國家，IP 圖型的國際識別性。二是知識與中國的進步接軌，例如紅、藍併立，例如橢圓形代表浩瀚宇宙象徵知識的無限性，以及整體造型穩重、向上象徵知識產權的推動將為國家的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但這些連結都是國家權力意志擬製的結果，首先，國際力量特別是發達國家經常利用壟斷專利限制中國知識產權的發展，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發展未必是友善的，未必是助力；第二，中國與知識也不必然連結，中國整體知識經濟表現不理想，國內數字鴻溝巨大。知識的無限性也未必與進步連結，知識產權要的不是知識的無限性，而是為經濟規律服務的知識，才能有助於經濟規律定義下的進步，如何化無限的知識為國家所用，為經濟服務，尚待努力達成。

因此，國際社會、無限知識對於中國來說是未知的，甚至是危險的，但是此

<sup>21</sup> 「關於局徽」。

<sup>22</sup> 「關於局徽」。

一圖示將這些未知和危險的事物，和中國、中國追求進步這些熟悉、樂觀的象徵連結起來。如此也就呼應了既有的語言符號，又能直接滿足身體的需要。也就是透過局微的象徵意義可見，知識產權此一符號滿足了身體既要求新奇刺激又要求穩定安全的欲求，也就是呼應了符號與身體共有的既要求有限又要求無限的邏輯。再進一步透過包括網路媒體在內的傳媒，經由各種法律、案例宣導，反覆宣傳知識產權此一商品，它就能夠吸引大眾消費的欲望，激勵人們努力追求。。

## 第五節、知識經濟時代身體政治學的理論意義

知識經濟時代的身體政治學對於 Michel Foucault 與 Giorgio Agamben 所思考現代國家的身體政治學，有如下幾點補充或修正，這也有助我們探討文化研究爭訟的「結構」與「能動性」課題，並進而反思中國研究的特殊意義。

首先，Agamben 指出國家與身體具有能動的同—性，此一「同—性」應該是指雙方在能動性展現上具有形式平等，但事實上仍是不平等的。特別是威權體制的大陸，黨國掌握法律，且較民主國家更大程度的介入傳媒，顯然國家居於較身體優越且安全的地位，黨國可利用這些力量繼續羅致各方支持，黨國應該只要在相當程度上完成保護人民身體，或者是讓社會感覺國家有保衛身體的誠意，即可維持其正當性。但本研究也不同意 Foucault 認為身體是全然被動柔軟的，身體在最低限度上，還是在既有論述設立的框架下，接受召喚、建立認同、產生實踐，這都是能動性的表現，在本研究的案例，我們也看到身體可以在不同論述間進行不同連結，例如爽歪歪連結童趣與色情，以創造爭議性，而創下銷售成績，或者是娃哈哈的商品都是去發現那些尚未被滿足的消費者，在微調現有商品中，創造新的產品。當然身體最終仍要論述來證成自己的認同，甚至要作為論述的他者來完成自我認同。但身體顯然已在論述之間被建構出活動的能力。事實上，當符號、論述經人建構，並取得自身的發展邏輯，而異化為人的主人並又反過來建構人時，被符號、論述建構下的人，由此又再產生相對於符號、論述的異化，人由此取得相對於符號、論述的自身的發展邏輯。例如現代國家的身體政治學，為了證成民族國家只好賦予公民權利；商品經濟為了求再生產，只好將身體建構為具有無窮欲望。而人也能動的、彈性的運作這些建構，導致國家與商品都必須求新求變，來滿足身體欲望的不斷微調。特別在知識經濟時代，因符號的意義生產在各方驅動下更形熱烈，更提高了人游走在從屬性、能動性、與解放性的機會與速率。因此本研究認為 Foucault 太過貶抑身體，Agamben 又太過抬高身體，是故本研究認為身體或國家的能動性是從屬於特定論述下的能動性。

第二，Foucault 認為身體政治學是以肯定或否定的手段，以提取身體最大能力為目的。在國家運用知識產權手法上，我們可以看到幾個特點：首先它是以激

勵為主，懲罰為輔，以將創意侷限在無關黨國的範圍中。第二，它是經由調動意識對符號的無限創意，以服務身體，連意識都要臣服在身體之下。這可說是自 Nietzsche 倡導身體即是一切以來，真正的、也是最驚心動魄的身體回歸。第三，在知識產權的運作中，身體政治學的真正目的應是維護那個發動身體政治的權力意志，即黨國體制、身體、多元論述等權力意志，而非以直接提取身體最大能力為目的。在知識產權運作中，它主要是提取了意識的力量，以服務於身體與民族。簡言之，提取意識或身體的力量是手段，權力意志本身才是目的。當然，這是針對知識產權研究後的看法，至於其他的權力運作機制，其他的身體政治學，尚須個別加以考察。

第三，現代國家的身體政治學是身體與國家的辯證統一，Hannah Arendt 認為，人權與民族國家相依而生，民族國家衰落必導致人權的終結。但知識經濟與網路科技，又創造了一種以全球為範圍的權力意志。由立基於國內法的知識產權研究中，已可見知識產權是國家為因應全球化壓力的調適，並可見到個人直接借力於其他國家法律或知識經濟全球化的狀況。因此身體、國家、全球的關係與連結策略也是作者未來須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建構出身體與全球化知識經濟下的身體政治學，此一問題也超越了 Foucault 與 Agamben 的身體政治學的思考。

另外，對於第一章提到的 Nicholas Negroponte、Daniel Bell、Herbert Marcuse 等學者對於知識經濟時代人的處境的思考，亦可提出本研究的看法。

首先，知識經濟下的社會究竟會因符號流動而走向一體化、平等化，還是分殊化、等級化問題。本研究認為基於論述本身就是二元對立、等級秩序，以及知識經濟在國家機器參與驅動下，論述競合更形激化這兩個主要因素，並且知識經濟的創意生產，是經由知識為經濟服務以進一步為國家服務的目的性生產，而非全然的任意生產，是故知識經濟下的社會將呈現有限度的分殊化，但又因為論述本身預設的等級秩序，所以它仍是不平等的社會。

其次，知識經濟時代下的人與符號能否互相化約。廣義而言，人也是由符號、論述所建構的。但在符號建構下，人常被視為意識與身體的二元對立統一體，在貶抑身體的時代裡，以從事符號生產為主的意識代表著人的本質，但在知識經濟與民族國家興起後，人向身體回返，知識經濟甚至要求意識為身體服務。因此人與符號的關係，被知識經濟更細緻的建構為符號、意識、身體關係，並強調符號與意識要滿足身體的須要。

第三，上述兩個問題其實是在反思知識經濟時代下的人是更加自由、自覺，還是更加侷限、蒙昧。批判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符號生產是一種文化工業，它完全依市場的需要來生產，它會不斷改良產品，但其實只是同一製造模式的不

斷重複，不會脫離原有的系統範圍。消費者的興趣也被導向只注意商品表面的奇技淫巧，而非針對內容，其實商品的內容總是千篇一律，即使今天所謂的個性化產品、量身訂製產品，都可以看到這種刺激性與馴化性。新穎與老套的同時存在。<sup>23</sup>本研究認為，以大陸的情況而言，創意商品多仍侷限在國內市場競爭，較無能力接觸到全球市場，因此知識經濟在大陸是更深刻的依靠國家主控的知識產權來開展，國家因此取得介入大陸社會知識經濟活動較大的能動性，但國家加大其能動性，也是相對的激化身體的能動性，因此本研究認為身體享有的是從屬下的能動性，具有在一定的範圍中進行多元連結的自主性。因此相對於批判理論的文化工業概念，本研究的看法是創意商品生產不全為市場服務，國家利用知識產權也界入了商品生產，由此來看，主導商品生產的立場不是單一的，而是幾種論述合謀，因此文化工業的生產線不只一條，既然生產線不只一條，文化產品不只為一個論述服務，人在其中就有進行挪用、重新連結的可能，由此取得能動性，得到一定的快感，人在此享有的是一種侷限下的自由。

在文化研究，「結構」與「能動性」的問題一向是討論焦點，前者較強調文化生產對人的宰制，後者較強調人在消費中得到快感，兩者的關係一直為文化研究所爭論。對此問題，總結以上，本研究的觀點較接近 Antonio Gramsci 的文化霸權理論或是 John Storey 的調和觀點。<sup>24</sup>文化霸權 (hegemony) 是指絕大多數人對主要支配群體加強於他們的社會生活方向，所展現的自發性同意 (spontaneous consent)。以歷史觀點來說，這種同意是由支配群體享有的威望 (以及伴隨而來的自信) 造成的。支配群體在生產世界裡佔有的地位與功能，使它享有這些威望。<sup>25</sup>因此群眾經由對霸權的同意，而爭取到能動性。此一觀點承認意義生產過程是在既有語言結構下進行，因此同時存在著人類能動與結構限制。每當創造意義時，人們必然運作於預設的論述結構中，因而也是處於被給定的權力關係內，但這些預設的結構與權力關係並非天衣無縫，人在論述夾縫中得到行動的空間。<sup>26</sup>文化研究是以文本為材料，其實包括知識產權、網路媒體等各種權力意志其最後的產品都是文本，若以上述觀點來看文本的生產，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文本會偏袒特定的論述。第二，文本的意識型態會由文本中一些內在衝突及斷裂而被誤讀與否定。第三，因此人對文本的收聽與解讀，未必符合既存論述結構下預設的意義，這也是人在文本下得享能動性的可能性所在。<sup>27</sup>

<sup>23</sup> 盧嵐蘭，現代媒介文化：批判的基礎 (台北：三民，2006)，頁 32-36。

<sup>24</sup> John Storey,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al*,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3), pp. 199-202. Storey 在書中即強調應重視 Gramsci 的觀點。

<sup>25</sup> Antonio Gramsci, David Forgacs ed., *An Antonio Gramsci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1916-1935*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8), pp. 422-426. Gramsci 利用「文化霸權」，使工人階級有機會與社會多元力量連結，開展了建立「歷史性集團」(historical bloc) 的可能性。

<sup>26</sup> 盧嵐蘭，現代媒介文化：批判的基礎，頁 105-104。

<sup>27</sup> 盧嵐蘭，現代媒介文化：批判的基礎，頁 85-86。



由上述結構與能動性互為鑲嵌的主張，進一步反思中國研究的特殊性，可有如下幾點看法：

- 1.有關國家與社會關係問題：中國作為一個後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集權與經濟國有的歷史背景下展開其資本主義的歷程，因此國家與社會、國家與身體的互動會是在一個相輔相成或相反相成的辯證統一中進行。<sup>28</sup>即使是知識經濟、知識產權這樣一些興起自 1990 年代，看似改革開放後才進入中國的新世潮與新概念，它們在中國也會順著國家與身體互為鑲嵌的邏輯展開。經由本研究可發現，知識經濟、知識產權是被用來強化、激化、活化此一鑲嵌關係。
- 2.有關大陸國家權力消長問題：順著上述結構與能動性、國家與社會互為鑲嵌的看法，大陸國家權力不是單純的因放權而弱化或因再集權而強化的問題，<sup>29</sup>而是黨國機制的權力將在每個具體議題上與社會互動，並藉由互動使國家權力不斷調適、不斷重構。特別是知識產權此一議題，國家權力的調適與重構將在知識經濟鼓動訊息流通、知識創意的氛圍下更為快速、激烈。
- 3.有關中國未來將向西方趨同或是走上中國獨特的道路問題：本研究認為，中國會以它獨特的、較偏向組合主義的方式去回應資本主義的全球市場，固然中國的外在表現上會是一個參與全球市場的資本主義國家，但其內部的運作流程將不同於西方國家。<sup>30</sup>資本主義全球化與中國本土化也將呈現互為鑲嵌的關係。<sup>31</sup>

由此觀之，經由國家與身體此一研究課題，可見中國研究有它特殊理論意義，可以開出與西方社會科學不同的研究典範。

## 第六節、身體的能動性與解放的可能性

「讓權力系統短路，並對權力系統進行肢解、拆卸。」是 Foucault 自陳其著

<sup>28</sup>李英明，*中國大陸學*（台北：揚智，1996），頁 105-125。

<sup>29</sup>Andrew G. Walder, "The Quiet Revolution from Within: Economic Reform as a Source of Political Decline," Andrew G. Walder, ed.,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5), pp. 1-24. 指出中共改革開放後，因放權讓利導致地方自主性而割裂了國家統一性，將導致一場由黨國高層觸動的「寧靜的內在革命」，使得黨國權威下滑。

Yongnian Zheng,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鄭永年則提到分稅制是國家再造的手段，黨國藉此得到再集權。

<sup>30</sup>Andrew G. Walder 著、龔小夏譯，*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中國工業中的工作環境和權力結構*（香港：牛津，1996），頁 97。組合主義指由國家來批准與規範民間的利益團體。

<sup>31</sup>Wu Yu-Sh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sia vs. Europe," *Issues & Studies*, vol. 38 no.4/vol. 39 no.1 (December 2002/March 2003), pp. 93-138. 文中提到中俄代表兩種國家社會主義與兩種發展模式，一是東亞資本主義發展模式，一是西方古典經濟學，中國的經改成就證明了東亞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效率。

書立說的目的。<sup>32</sup>同樣的，文化研究的途徑，也是在於批判主流論述的連續性與必然性，以揭示其破碎性與偶然性。批判的目的是由解構中發現人自求解放的機會，亦即使人得到展現各種可能性的機會。經由上述的討論可知，知識產權是國家回應知識經濟潮流的偶然建構，且知識產權能發揮其強制性是國家主導多元論述共謀下的結果，國家必須在多元論述支持下，才能得到正當性行使權力，並經由反覆宣傳以強化其正當性。且多元論述之間是各有盤算的依附在國家周邊，知識產權的意義建構不是本真的由國家單方面主導。但此一狀況下，人或身體是否由此得到更多的自由空間，以下將進行闡釋。

有關人的能動性的問題，在本研究的案例中，可以有如下幾點啟發。

首先，現代國家身體政治學是一種身體和國家的能動的同—性，由前述的討論可見，民族國家與個人身體在身體話題上得到連結，國家與身體在提取身體能力、追求身體滿足發展的話題上均取得從屬於身體話題的能動性、行動的正當性。但能動性不意味著絕對的自由或解放，能動性意味著接受論述的召喚，在論述設定的二元對立、等級秩序中取得行動的空間與認同，能動與從屬是辯證統一的关系，因此是一種從屬下的能動性。所以國家和身體均有能動性，但必須注意那是從屬於現代國家身體政治學論述之下的能動性，是一種以從屬為前提的能動性。

因此，雖然在王同億事件、漢芯案會看到主流立場、非主流立場的聲音，而呈現眾聲喧嘩景象，但這些聲音均不出黨國為公/為私、民族先進/落後、知識創新/造假、經濟規範/無序幾個固定的意義框架。即使是非主流立場，也未逃出幾個固定框架的限制。

但無論如何，知識經濟、知識產權，使意識為身體服務，反轉了意識與身體的關係，並且讓身體在接受國家提取力量的前提下，可以游走在幾種論述立場之間，這總是提供了身體較多的從屬下的能動性。特別是網路媒體的特性，雖然它們有利主流立場的再生產，但它們是雙面刃，也可能促使不同連結產生，這包括：第一，媒體基於市場需要，必須陳列幾種不同的聲音，以平衡報導取信於消費者，或滿足不同的消費口味，導致網路媒體會存在多種論述的框架。第二，數位化訊息的易於複製，各種主張都可能被廣為轉貼而傳播，易於複製也挑戰了知識產權的立法與執法能力。第三，數位化資訊在儲存上的便利與廉價性，導致許多舊聞、新聞並存，提高了誤讀的可能性，與因誤讀產生顛覆性的機會。第四，多媒體、超連結提供讀者連結不同文本的暗示，因此各式各樣的連結得以建立，人也隨之游走在框架之間。第五，數位化資訊的快速傳播，不同的框架，與不同的框架連

<sup>32</sup>Marvin Chlada、Gerd Dembowski 編著，朱毅譯，福柯的迷宮（北京：商務，2005），頁 1-14。

結形式因此被加速散播出去。<sup>33</sup>

其次，至於多種連結的可能性對人的意義何在，以漢芯案為例可見，這一個多元論述形成的多種引力，是面向每一個人的，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是謹守主流立場的人，也可能是奉行非主流立場的人。每個人都同時面對多元論述的召喚，在不同的具體遭遇上，隨時可能被不同立場收編。<sup>34</sup>在漢芯案或王同億事件中可見，同樣是學界中人，有的查察造假、務實求真，有的包庇虛浮、務虛逐利。或者如陳進，曾經想依主流價值行事，或也自覺認定主流價值的正當性，後來卻因為方方面面的引力，進行了假借主流的非主流實踐。更進一步言之，務實求真與務虛逐利者，是互相潛在的，崇尚主流者有可能向非主流轉化，反之亦然。換言之，不能由一個人所具有的認同與身份，來簡單的判斷一個人的認知與行為，人是隨著所在語境中的多元論述而有多種認同與實踐的可能。

若依此一意義來看，像知識經濟的身體政治學這類論述，它是如同 Gramsci 的文化霸權理論所說的，其實是國家與身體協商、共謀，雙方同意下的結果，身體與國家都利用此一論述在借力使力，希望伸張自己的意志。<sup>35</sup>身體在其間仍可透過游走不同框架，或嫁接、挪用、連結既有的框架享有某種意義限制下的快感，如王同億與陳進即在其間找到縫隙，進行非主流實踐，而一度名利雙收。又如爽歪歪此一商品名稱，提供消費者純真童趣或情色快感的多種想像，使得消費過程產生更多不同的樂趣。而國家機器雖然必須全心全意的為人民身體服務，以爭取統治正當性，但在知識產權法的法律內容中，在假借維護公平競爭的名義下，也從中偷渡了國家的利益，為國家留下最大的裁量空間。當然，由此一能動性，人或者激進民主的追求者也就可能如 Ernesto Laclau 和 Chantal Mouffe 所說，能夠進一步利用論述的連結，創造論述邊界的模糊性，使論述具不確定性，而從屬於不確定性論述的人隨之也取得更大的能動性。<sup>36</sup>但也不宜誇大此一人民的能動性，不應忘記的是，處於另一端的國家機器也在運用此一能動性，特別是大陸為威權國家，黨國體制相對易於集中力量，在爭奪論述霸權時顯然居於優勢，此由前文的討論中，黨國體制因掌握了法律與宣傳工具，因此在多元論述中顯然較具吸引力與主導性可以證實。

更進一步有關人的解放、人追求絕對自由的問題，在本研究的案例中，可以有幾點啟發。

---

<sup>33</sup>Antonio Callari & David F. Ruccio eds., *Postmodern Materialism & The Future of Marxist Theory*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48.

<sup>34</sup>John Storey,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al*, pp. 181-198.

<sup>35</sup>Stuart Allan 著，陳雅玫譯，*新聞文化：報紙、廣播、電視如何製造真相？*（台北：書林，2006），頁 90。

<sup>36</sup>Ernesto Laclau &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London: Verso, 2001), pp. 192-193.

首先是以包括網路在內在現代通訊技術與知識經濟的驅動力量，似乎使人容易跨越國界，體會到主權國家之外的全球互動，例如王同億會引述外國著作權法來為自己的著作的抄襲問題辯解；陳進利用他在摩托羅拉公司的工作經驗，而將其晶片混充為自己的發明；娃哈哈在成為中國民族飲料品牌後，也要進一步追求成為世界品牌。到處充滿著民族國家之外別有廣闊天地的想像，但也不宜誇大此一全球化效應，因為人在擺脫民族國家的論述權威後，可能只是從屬於另一全球帝國的論述權威，終究還是從屬的位置。更何況，各主權國家均在全球化過程中力爭上游，希望借力使力，確保甚至提升國家權威，此由各國莫不大力推動知識產權立法、執法即可顯示。<sup>37</sup>

第二，知識經濟、知識產權的論述強化了意識向身體的回返，過去被宰制和放逐的身體地位受到重視與提升，但這也不是身體的解放，身體是以從屬於國家主導的知識產權的論述，來換取知識經濟下的重要性。

第三，Agamben 認為如難民這類「牲人」，經由切斷公民身份，而使身體擺脫民族國家宰制回歸赤裸生命，才是身體的真正解放，此一論斷也有幾個問題，首先在全球化知識經濟時代，身體切斷了與國家的關係可能又要從屬於全球化的論述。其次，身體要切斷與國家的關係，是一個零敲碎打的過程，由王同億與陳進的例子來看，他們是在知識經濟問題上被國家放逐，但其他方面仍在主權國家掌控之下。第三，身體若要進一步切斷與各種論述的關係，除了死亡外，可能就只有身體漂移到多元論述之間，在多元論述間一空倚傍的茫然時刻，此時認同失落、意義消失，身體才暫時回歸赤裸生命。若再結合前述對能動性的探討，其實每個身體都混雜了從屬性、能動性、與解放性等可能性，而且人的從屬性、能動性、與解放性，通常不會是全面的，而是隨著特定的議題而有不同。特別在知識經濟時代，因符號的意義生產在各方驅動下更形熱烈，更提高了人游走在從屬性、能動性、與解放性的機會與速率。

有關解放與能動性的另一個常見問題時，解放與能動性的機會是否均等問題。其實當我們提出「經由閱聽網路媒體建構的知識產權，是否會對身體提供平等的解放機會？」的問題時，即已預告了答案一定是不平等，因論述本身就一個伴隨某一權力意志建構起來的二元對立、等級秩序，因此從屬於某一論述下的解放機會或解放的可能機會一定是不平等的。具體而言有幾個方面：第一，國家機器在知識經濟上的不平衡戰略，既然中國是要透過保護知識產權以利用知識經濟對其他國家進行追趕，則一定是鼓勵部份條件足夠的人先行發展，引導創新的指導方針是「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國家機器調動每個人

<sup>37</sup> 劉樹成、張平，「新經濟」透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369-413。

的身體的力度是不同的，身體隨之進行作用和反作用的機會也將不同。第二，數字鴻溝的存在，發明知識商品與流通或消費知識商品，均要具備一定的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而每個人持有的資本量也是不均等的，因為知識經濟而來的從屬、能動、解放的機會也將不平等。特別是數字鴻溝中的優勢群體，若要依此而將知識產權、知識經濟操作為維護自己既得利益的工具，則必須限制資訊的流通，與限定資訊的詮釋權，這將使優勢群體陷入做繭自縛的處境，不僅限縮資訊弱勢群體在知識經濟中的可能性，也將限縮自己在知識經濟中的可能性。

至於網路媒體是否提供人更多的解放與能動性，經由本研究的案例可見：就積極面而言，網路傳播中訊息的高速、廉價複制的意義應是在於經由不斷重複幾個既定框架，而增加不同框架進行新連結的機會，或因新舊文本並存，提供文本被誤讀、錯接的機會。就消極面而言，網路傳播的訊息高速、廉價複制特性，主要是有助既定的幾個論述框架的強化，而不是直接導致意義內爆與無限創意。

綜合以上所述，人的能動性與解放性的可能性在於：一方面經由在多元論述間進行跨界連結，跳脫出非黑即白的立場選擇，經由運用論述的鑲嵌關係，創造實踐的空間，在矛盾的張力中展現身體的能動性。二方面在身體欲望初動而無所歸屬與認同的偶然？那，暫時自被動的受論述宰制或主動的在論述中對號入座中逃脫出來，在這裡展現身體的解放性。

總之，本研究認為知識經濟時代，多元論述提供給每個人身體的取得從屬性、能動性、與解放性的機會是不平等的。看似水潑不進、針插不入的主流立場或文化霸權，是可以被拆解成多元論述，身體在其間可以進行不同的連結，進行零敲碎打的工程，此即身體的能動性所在。特別是現代國家的身體政治學，國家與身體在保障、發展身體的問題上取得協商的空間，人與國家均可利用保障、發展身體的議題取得行動的正當性，但此一行動均是以身體政治學此一論述為前題，因此是一種從屬下的能動性。身體若要尋求解放，擺脫從屬於論述的地位，則只有在身體漂移在多元論述之間，意義消失的時刻才得以實現。特別是知識經濟時代，因符號的意義生產在各方驅動下更形熱烈，更提高了人游走在從屬性、能動性、與解放性的機會與速率。

